

台湾当代文艺传媒

《文訊》研究

文訊

廖斌◎著

当代文艺传媒《文讯》研究

廖斌◎著

本书获武夷学院科研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湾当代文艺传媒《文讯》研究/廖斌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309-08548-8

I. 台… II. 廖…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台湾省 IV. I209. 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1504 号

台湾当代文艺传媒《文讯》研究

廖斌 著

责任编辑/胡春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71 千

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548-8/1·646

定价: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一、文学与媒介的共生互动关系	4
二、现代文学传媒的组织化生产	10
第一章 台湾文艺期刊谱系与台湾文学场域	15
第一节 台湾文艺期刊研究综述	15
第二节 台湾文学场域与“文讯现象”	29
第二章 《文讯》的文学史料保存与文学史构建	76
第一节 《文讯》：鲜活翔实的现代台湾文学简史	76
第二节 《文讯》文学史书写及其“观念”	90
第三节 《文讯》文学史书写及其策略、特质	100
第四节 《文讯》：台湾现代文学资料库	121
第三章 《文讯》的文学研究规划与专题策划	147
第一节 《文讯》对文学研究的规划与设计	147
第二节 大众传播学与期刊编辑学视野中《文讯》的专题 策划	179

2 台湾当代文艺传媒《文讯》研究

第三节 《文讯》专题策划的特色·····	187
附录：《文讯》300期专题目录·····	197
第四章 《文讯》的文学批评与文学资讯·····	210
第一节 台湾的学院批评与大众媒介书评·····	211
第二节 《文讯》的大众文艺批评·····	217
第三节 《文讯》文学资讯的文学史意义·····	237
第五章 《文讯》的品牌铸造和文艺伦理构建·····	254
第一节 《文讯》的文学角色担当与办刊的品牌活动·····	254
第二节 《文讯》对文学场域文艺伦理的建构·····	277
第三节 《文讯》的儒家思想谱系与济世人格·····	297
参考文献·····	310
后 记·····	323

绪 论

“杂志”一词,是从“magazine”翻译而来,原意为“仓库”,借喻为包含体裁多元、议论多样的刊物。杂志虽然起源甚早,但是早年并不如图书一般受到重视,随着信息的快速增长,杂志的特点突显其优势,因为杂志可以连续地定期(或不定期)发刊,对于某一个主题可以追踪其最新发展,若涉及多个主题性或是跨越学科性值得探讨的主题,杂志就更能发挥其特长了。杂志是传递一般讯息和发表研究发展成果更快捷的通道,也是记录当代人文、社会、政经等活动最重要的媒体,由于是定期或不定期连续发行,具有随时可以反映国际时事及政经民情的特色。一份杂志就是一个生命的轨迹,从杂志看世界,更能看尽时间的流转与世事的变迁。杂志原是以不设定结束时间为创刊的理想,然而,在长期的连续出刊与经营中,杂志免不了要面临各式各样的变动,因此,生老病死、分合改并,就如同人的一生,杂志的试刊、创刊、停刊、复刊、加刊、分衍、续办、合并也会不断发生,更遑论改刊名、改编次序号、改主编、改刊期、改出版单位等各种异动了。

本雅明说:“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展开的。”^①大众传媒与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依靠传媒的刊载、评论、传播,文学方得以保存、流布和发展,才能对民众、对社会、对美学观念与道德等方面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而言,文学作为由创作行为和哲学行为共同组成的文化现象,

^①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44页。

无论是创作的主体还是接受的对象都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两个重要部分要靠特定的传播媒介来联结、组合。离开了媒体,任何文学的接受都成了空中楼阁;离开了传媒,任何文学的创作也都可能只是藏之名山,不为人知。当人类进入大众传媒时代,传媒与文学的关系比任何时代都紧密,传媒对文学的影响也比任何时期都明显。赵抗卫在《文学作品与现代传播》一文中说:“现代各种传媒和传播手段一方面在影响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使得文学作品在更大的范围得以传播,产生影响。传播使得文学的形式、小说的叙事内容和方式都产生了变化,中国的现代文学包括现代小说几乎是与现代传播同时形成并相互促进成长的。没有现代传播技术的产生,也不可能有现代文学的诞生。”^①

文学发展与文学媒介的关系,是无法分割的。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一书中起笔就说:“所有文学活动都是以作家、书籍及读者三方面的参与为前提。”换句话说,作为社会学的领域,文学脱离不开作家、媒介以及读者三方面的互动。探究一个国家、地区的文学发展,无法忽略作家、作品,以及前述两者对于社会所起的影响与意义。从文学的视角来看,社会是由文学反映出来的,历史是由文学书写出来的——介于社会的横切面和历史的纵切面之间。文学通过图书、杂志、报纸副刊、网络等媒介,才能彰显它对当代与后代读者的影响,从而再现(representation)历史与社会的形貌。从这个角度切入文学发展历程,我们就不能不密切注意文学传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与功能。总体来说,文学媒介具有五大职能:一是反映文学与当代社会的互动;二是推动文学思潮与活动;三是凝聚文学社群与文化认同;四是提供作者发表园地与培育新人;五是提供读者教育与娱乐。而这不仅是文学的,也是文化史意义的彰显。没有一个作家,没有一种文本,能够脱离媒介而独自生存,或者传播开来,流传下来——这说明没有媒介,也就没有文学的道理。大陆学者蒋晓丽在它的专著《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中论述了文学与媒体的关系是

^① 赵抗卫:《文学作品与现代传播》,载《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5期。

“依存关系、因果关系、互动关系，是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①。

在包含文本、书籍、杂志、报纸副刊与网络等诸多不同形式的文学传媒之间，能综合前述四大功能的，又以文学杂志为最。手稿与书籍，通常是作家个人创作的展现，难以显现凝聚文学社群与认同的力量；报纸副刊虽然集结不同作家的创作与论述，但因为作为传播媒介的“大众”定位与特质，也通常必须回避对特定文学社群及思潮或作品风格的过度强调与集中。至于新兴的网络媒介，则因其“个体性”、“匿名性”、“虚拟性”的特质，截至目前，尚难看出社群与文化认同的影响。只有文学杂志，尤其以严肃文学杂志来看，在中国台湾地区新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一直表现出强烈的社群特质。它们在凝聚文学社群与文化认同，推动文学思潮与活动的两个方面，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具有对台湾新文学发展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文学杂志就没有台湾文学，但可以说，没有文学杂志，则台湾新文学史就势必缺掉一角。从1920年台湾留学生在东京创办《台湾青年》杂志以来，台湾新文学发展都与文学杂志发表作品、传布思潮、结盟成派，乃至与社会、历史产生互动，进而积累为台湾文化史的一部分。

台湾新文学运动发展迄今八十余年，期间跨越两个不同的年代，文学杂志屡仆屡起，家数繁多，根据《文讯》杂志2003年的统计，自1920年代迄今，台湾的文学杂志有361种之多，呈现璨若星河的特质。台湾新文学的传播，通常说由《台湾青年》而《台湾》到《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的“台湾民报系”为首要媒介。初期的台湾新文学发展，正是依赖以《台湾青年》为首的“台湾民报系”的鼓吹与刺激而展开。其中，较关键者是反映文学与当代社会的互动、文学思潮的涌现，以及凝聚文化认同的一部分。虽然“台湾民报系”在杂志阶段仍非纯文学杂志，但一直到1932年《台湾新民报》改为日报发行之前的十二年间，它的文学/文化杂志性格则相当浓厚，成为如叶石涛所说的“台湾新文学运动的根据

^① 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巴蜀书社，2005年。

地和大本营”，因此在台湾新文学运动发轫期间，“台湾民报系”实际上扮演了文学杂志的角色。

由是观之，台湾文学自日占时期以降，文学/文化杂志、报纸副刊、文学出版社，以及因特网兴盛的近十年来的数字文学社群，承载了当代台湾文学丰盛多元的表现。也由于社会的变革、教育的普及、科技的进步，媒介本身的结构、生产技术、流通方式也不断改变，对文学产生了质变和量变的影响，同时也转变了读者的阅读行为。因此文学创作与活动在媒介机制的运作下，与社会产生复杂互动的关系，也呈现多元缤纷的文学出版样貌。在此变迁中，应该有几点可供探讨：一、文学媒介与文学发展；二、文学媒介的历史考察；三、文学媒介的比较研究；四、文学媒介的制作与经营。本书关于台湾文艺期刊《文讯》的研究，将会重点不一地涉及这几个方面。

一、文学与媒介的共生互动关系

1. 媒体是文学的耕耘园地

任何文学文本都离不开物质化的载体，无论甲骨、竹简，还是纸张、帛锦，总有一种物质的承载方式。即便行吟口传文学，也需要他人挖掘整理，以物态方式呈现。从物质形态上看，近代传媒的兴起和作为对古代低级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提供了有效的传播介质和传播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就是载体，现代传媒即现代文学的载体。这一基本性质体现了它的物化特征，也是传媒与文学的最本质的联系。现代文学的滥觞与发展即现代传媒的出发与进步，现代报纸杂志与现代文学相生相随，这在学术界早达成共识。但辩证看，传播媒介的改良进步不必然会表现为文学的进步发展。近代印刷报刊的催生，其出版速度、印刷质量等较之从前有很大提高，但是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不一定随着印刷速度和质量的提高而相应提高。两者不是相互促进的正比关系。但媒体的确会带来崭新的文学观念，促使作家选择符合传媒版面刊发的文本类型，产生新闻性、

纪实性的传媒文学类型,催生职业作家等。

从媒体的发展历程来说,现代传媒对文学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诸如创作队伍、现象思潮、体式兴替等。现代传媒的普及化大规模发展需要众多作家从事写作。在现代传媒时代,作家既存在着“潜在写作”,也可能基于道义与社会责任感抒怀,或者是为稻粱谋五斗米而写作,无论持何种创作态度,都与报刊的出版传播相关。此时版面框架里凝结的人生追求、文化理想、情感态度,或者说,作者的人生理想、社会责任、心灵世界,以物态凝固的方式闯入受众的期待视界,作者的写作不再是“藏之名山”的潜在写作,他们的隐秘幽微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安德森认为:“报纸只不过是书籍的一种‘极端形式’,一种大规模出售,但只是短暂流行的书。或者我们可以说,报纸是‘单日的畅销书’吧。尽管报纸在其印行的次日即宣布作废——奇妙的是最早大量生产的商品之一竟如此地预见现代耐用品容易作废的本质——然而也正是这个极易作废之特性,创造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对于作为小说的报纸几乎分秒不差地同时消费(‘想象’)。”^①在此,安德森实际上已经触及了报纸杂志对构建“想象的社群”、“公共空间”的作用。

2. 媒体是文学交互的桥梁

传播媒体的介质性是不证自明的。作为物质载体,报纸杂志乃文学传播的主要工具,大多作品均要通过特定的媒介对外传播,在此意义上,媒体即中介。中介性是传媒一个鲜明的特点。所谓“中介性”,既说明它的居中性质,即它处于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又专指它的交互特性。在它的框架内,传受二者得以交流信息、发生关系。报纸杂志就犹如一个中枢纽、一座立交桥,所有的文学资讯、思潮、评论、创作、论争等均在其中交换、流播、中转、碰撞、孕育、消费。在有关传播媒体与文学研究中,人们多瞄准传媒的中介特质开掘,从作者与读者、出版者与创作者

^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的关系层面多向度清理。实际上,对传媒“交互性”的分析更加注重自身的能动性、积极性、组织性、调控性与网络建构的功能。所谓“交互性”有三方面的意思,一是指传者与受众的关系,二是单向度看,它的文化传播的功能,三是它的吸纳构建的功能。时至今日,网络的兴起,带来电子报刊媒介的红火。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①一书中提出了“流动空间”的概念。流动空间不仅突破地理空间和时间维度,吸纳了分散在全球各地的文学文本、资讯和作者,而且塑造了彼此认同的文学人口,造就了“想象的文学社群”,进而可能建构出共享共存的“公共论域”。台湾学者向阳就论述了《文讯》对世界华文文学论域之形成的努力^②。

首先,总体来看,居间的传播媒体主要起了联结传者与受众的作用,使作者摆脱了旧式文人的狭小圈子顾影自怜。藏之名山或流布于小圈子的作品一旦发表,就不得不面对读者和评论者的阅读、研判。一般来说,办报办刊都会按照市场细分的原则有预想的读者群,套用安德森的概念即“想象的共同体”。从出版角度看,他们透过报刊构筑了一个由创作主体、编辑出版主体和读者接受主体共同参与的社群,文学的出版传播烙上了深刻的“共同体”的印记,带有“想象的共同体”的鲜明特质。在报刊的主办者看来,上传下达,去塞求通,是传媒职责所在,要完成媒体的这个重责大任,就必须广泛联络,将创作者的思想认识或国家民族大事传达给读者。在安德森和王德威那里,文学已经被提高到“现代民族国家”叙述的高度。因而,现代传媒的交互性质早已超出作家与读者的简单两极,而是在多方的交相运动过程中,完成国体、国格、国魂的铸造与凝聚。

现代传媒融合作者和读者的作用,还在于对作家创作的引导及对处于期待视野中的读者的召唤结构。出版家和文学家在民族叙事中完成的“想象的共同体”,既是作家创作的过程,也是文本被读者再创造的

^① 参见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② 向阳:《一个公共论域的建立与健全》,载《文讯》第273期,第3页。

过程。在其间,读者也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施与和受与中被启蒙,当读者以定向期待选择报刊、阅读作品时,读者实际上参与了这个“共同体”的建构过程,并且以自己的理想修改着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或者说,作家既要接受读者的选择,又要通过读者对报刊的选择而调整自己的写作策略。

其次,媒体是作家之间联系的纽带。现代报刊对于文学的帮衬,一个极其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团结、凝聚知识分子,在报刊的大旗下结盟图治,即以报刊传媒为核心的知识精英借报刊为发声管道,集合同道,自立山头,或创作或论争,形成文学史别样的风貌。台湾《文学杂志》发刊初期,主要是夏济安、刘守宜、吴鲁芹以及宋淇(林以亮)等为中心的知识分子,不满于“战斗文艺”的高调喊得震天响的年代,希望继承数千年来的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提倡朴实、理智、冷静的作风,认为一个认真的作者,一定是反映他的时代表达他的时代的精神的人。报刊媒体的介质性成为文学社团形成的主要动因。报刊成为一代知识分子集聚的主要场所、对外宣言对内共谋的阵地。从1930年代的《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到1950、1960年代台湾的《中外文学》、《文学杂志》、《现代文学》等,正是由于上述阵地的拓展,才将沈从文、萧乾、朱光潜、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林徽因等集结到一起;才将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余光中、李欧梵等感召在一起。可见刊物作为枢纽站的意义。

报刊之于作家之间的组织功能,不仅使文人们得以结盟共谋,形成社团流派的强大力量,而且还使荷载独行的“夜行者”得到同盟支持,不至于形单影只,从而获得了归属感。如《文讯》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构建了华文文学圈“流动的空间”,使得台湾文坛人士,地不分南北,人无论蓝绿,都团结在以文学为本位的周遭,并且营造了长幼有序、智慧薪传、团结和谐的文艺伦理,成为台湾当代文坛的俱乐部。

再次,传媒的中介、交互功能还表现在中西文学文化的交流上。在现代传播媒体向读者传播了文学的同时,也将西方社会思想、文学创作等传播到中国来,成为中国与世界的“桥梁”。这种传播方向是交互和

双向的。现代传媒引进的不仅是西方文学作品,更播撒了现代文化观念和文学观念。如果说是西方文学为中国现代文学催产接生,那么,现代传媒以水平接受的方式直接将中国文学并入世界文学格局,将中国作家和外国作家置于同一传播场域中,建立起了现代文化传播视野中的东西方文学的大格局。东西方文化的合流、撞击,正是在媒体视界中的合流和碰撞;所谓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传媒视野中才会建立起这种文学观念。梵·第根说:“在两个民族文学交流的方式中,‘媒介’应给予重要的地位。媒介为外国文学在一个国家中的扩散,为一个民族文学吸收采纳外国文学中的思想、形式提供了便利。”^①作为“媒介”,台湾文艺期刊中的《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中外文学》,在沟通中西文学方面,都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发展影响深远,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比如白先勇等人创办的《现代文学》就大量地译介了西方的文学理论、思潮和作家作品,先后介绍了卡夫卡、汤玛斯·曼、乔埃斯、劳伦斯、伍尔夫、波特、沙特、福克纳、亨利·詹姆斯等。这些介绍虽然显得较为肤浅,但是“对1960年代的台湾文坛有很大的启发”^②。白先勇认为,当时的五月画会、东方画会的成立,创世纪、蓝星诗社的兴起,《文学杂志》、《笔汇》、《现代文学》以及《文学季刊》的诞生,都显示了“西方文艺思潮的入侵。正好给迷惘彷徨中的台湾知识青年一种外来的刺激与启蒙,于是,一个新文化运动在台湾展开”^③。何欣在《中国现代小说的传统》中说:“《文学杂志》和四年后创刊的《现代文学》在介绍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与重要的作家方面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西方文学理论与技巧为年轻一代的作家所吸收,所实践。他们也影响了以前从未接触过西方文学的作家,也影响了以后的杂志如《纯文学》、《幼狮文艺》等刊物的发展路向。然而也就在此时,西方的文学理论和作家‘不加选择地’介绍进来,又被读者‘不加选

① 梵·第根:《比较文学与文学原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0页。

② 刘登翰:《台湾文学史》第2卷,现代教育集团,2008年,第473页。

③ 白先勇:《第六支手指》,文汇出版社,1999年,第117—118页。

择地’甚至是‘曲解地’接受。在创作上,他们应该接受前一代的影响,但是他们看不到前一代的作品,在习作模仿期他们从西方文学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①

3. 媒体是文学的第一语境

报刊是社会化产品,是文化形态的表现形式,报章杂志的发展为文学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文化氛围、话语方式和言论空间,甚至作为文学的素材进入到作品的叙事结构中。从此意义上说,媒体即语境,文学则是浸润在这个语境而发生和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

现代传媒与文学的语境关联主要有三层意思:一是现代传媒所建构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文学的传播语境。二是从文学传播的社会学意义来看,现代媒介及其传播现象展现不同文学社群的起落生灭,及其相对于社会/文化变迁的互动姿彩,对应和传播着时代孕育的文学思潮。比如,从主流来看,日占时代的《台湾青年》、《台湾新民报》、《台湾》的呼风唤雨,影响台湾新文学与文化的基础建设;起于50年代《文学杂志》到60年代《现代文学》主导的现代主义书写风潮;起于60年代《台湾文艺》以迄于今的《文学台湾》延续的写实主义书写脉络等,在这样的传媒语境里,我们看到一群文学人及其社群如何以文学书写、论述和他们所处的时空展开对话。三是现代报刊所提供的传播方式,为文学、文化所需要的发表与讨论,提供特定的传播空间。现代报刊因其连续出版、快速流通,资讯交互、思想激荡而为文学人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提供了舆论平台,也为“众声喧哗”提供了条件与便利,并由此借助媒体优势,构筑了系统而完整的写作、出版、接受和讨论的网络架构。比如《文讯》策划的大量的座谈会、研讨会、文学展、文学尖峰对话、人物专访都及时地刊载,造就了很强的现场感、动态感、参与感,引领人们感同身受地进入到它所营造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丰富

^① 何欣语,转引自应凤凰:《战后台湾文艺杂志发展历程及系谱(1949—1987)》,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性的语境里。在这个多元并存的语境里,文学史的原初样貌得以留存,“准文化公共空间”得以建立和健全。

二、现代文学传媒的组织化生产

1. 传统文学生产的转向

中国传统文学生产机制,是以知识阶层特有的身心经验为边界的自我封闭系统。它的存在基础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不发达使文学作品很少以商品的身份出现。由此形成的文学价值观念决定了与文学作品关系密切的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传统文学观念将文学作为“明德”、“载道”的工具,“代圣贤立言”是创作的最高标准,“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共同梦想。文学创作没有直接的经济目的,而是“入仕”抵达国家权力阶层,跻身上流社会的阶梯。文学观念的政治功利性,加之文学形式(文言)与普通大众在接受水平之间的距离,使传统的文学生产局限于有限的文人圈子。

在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中,传统文学生产机制凸显出封闭性特点。

关于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式与传播途径,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就“小说”这一体裁做出过精彩论述:“借小说以自娱,息心静气,穷十年或数年之力,以成一巨册,几经锻炼,几经删削,藏之名山,不敢出以问世,如《水浒》、《红楼》等书是已。”另一种方式是文人之间的唱和。而传播方式则主要表现在传唱与传抄上。像宋词一般通过歌者的传唱得以推广。而传抄在出版业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是作品流通的主要方式。“洛阳纸贵”的典故便是这类文学传播方式的形象表现。当然,文学作品有时也通过出版来传播,古代有些作家也兼事出版,但主要是防止作品散佚以编辑成册,而且多是为了追求后世的声名,和“现在时”、“进行时”的传播效应大不相同。印刷技术的落后,也制约文学出版业的繁荣。从文学作品的消费情况看,古代作品表现出封闭自足

的贵族气息，普通大众游离于文学生产机制。

由此看来，依托商品经济的发达、出版业的繁荣和大众文化的兴起的期刊，只能出现在传统文学生产机制解体之后。这样的条件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成熟了。期刊的出现标志着一个现代文学生产时代的到来。

带来这种转化的首先是经济模式的转变。19 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封建自然经济解体，商品经济得以发展。它所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出版业的繁荣。随着西方商人及传教士东来，为宣传商务、推广教务，把资本主义的近代文化、技术与报刊形式介绍进来。随着新的印刷技术的传入，中国出版业与报业日益勃兴，这为中国现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促使传统文学生产机制解体的是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五四时代，文学不再是封建社会“载道”的工具，而是谋求人的解放的武器；作家不再是权势者的附庸，而是独立的不再依傍他人的精神个体。“五四”文人摒弃了为权势、代圣贤立言的文学观念，作为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实现了与权势者的“政治”脱离，走向了为大众的“政治”和为生存的“经济”的统一。即一方面指现代文人自觉担负起了启蒙国民心智和为民请命的责任；另一方面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近代出版业的发展，稿酬制度的确立，可以将创作作为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手段。这两方面的“功利性”都要求作家的创作要迅捷，不允许传统生产机制中的“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创作周期，有“朝脱稿而夕印行”的要求；在文本的传播方面，要求媒体迅速而广泛地向社会传递声音；在文学消费方面，要求受众超越文人圈子，容纳广泛的非智识阶层，以拉近精英文化与世俗社会文化的距离。现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形成得益于文学传播载体的发展，近现代书、报、刊的繁荣同一个开放性的现代文学生产机制实现了同步发展。

在书、报、刊三种现代文学主要传播载体中，现代知识分子对期刊的垂青是显而易见的。林立的现代文学社团多以期刊树立旗帜。这是因为较快的传播速度使期刊优于书籍，而较大的容量又优于报纸。期

刊为作家艺术个性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增加了文人横向传播思想的机会,打破了传统士大夫封闭的话语系统,增强了不同群体作家的比较意识,扩大了影响。因此,期刊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传播媒介的首要选择。加之初创期国内办刊制度的宽松,期刊的发展异常繁荣。仅1919—1920年间,创办的期刊就近100种。1909年到1921年,文学期刊已经有52种,从1921年至1927年春,全国创办的各种类型的期刊达500多种,超过此前各个时期所出版的总和^①。

2. 文学期刊生产的组织化

与传统的文学生产不同,现代文学生产脱离了旧式文学生产封闭自足、自娱自乐的束缚,具有现代化、社会化生产的基本特质:组织化、协同性、规约化、集约化、标准化、流水线等,反映了现代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现代传播的诞生,为文学生产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而作家、编辑、读者的新型关系也由此建立起来。正如人们所言,“期刊编辑是组织化的个人”,其中,文学期刊就是现代文学生产的基地,是文学得以面世、发表的园地,职业作家赖以生存的耕耘地,作家、编辑、读者三者之间沟通的桥梁;是文学思潮的策源地,文化思想交锋的阵地,文学研究的实验田。在文学场域的各要素的占位中,期刊居于有利位置,掌握了较主动和充分的话语权。总之,文学期刊是现代文学生产的核心机制,是现代文学生产的缩影和堡垒。

从上述意义来说,文学期刊最大的特点是组织化生产和对文学生产的规约、引导。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红岩》等“革命历史小说”的集体创作、组织化生产进行过论述,认为这是官方基于确立“文化领导权”的合法性,而进行的革命历史教育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叙事。文学期刊的组织化生产与之有所不同。首先,文学期刊是在市场规则的前提和影响下运作的,它必然要遵循一定的经济规律,期刊的宗旨在办刊过程中要逐步得到落实,但这又不完全等同于生产车间

^① 范伯群:《中国近代通俗文学史》(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52—554页。